

查清华 詹丹 主编

# 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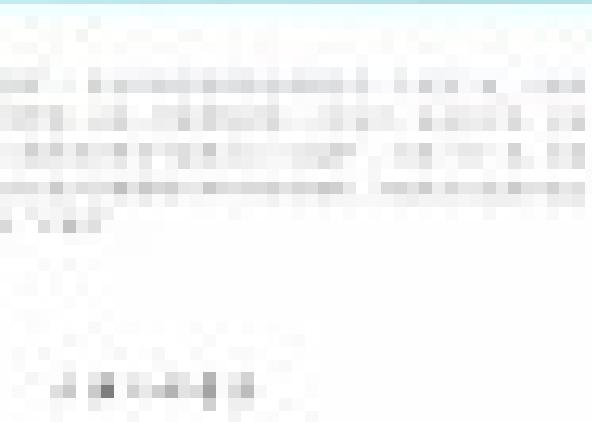
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论文集

“江南”之为“学”而称之为“江南学”，是对江南区域研究的学理升华。从本质上说，江南研究是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综合性研究，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大而言之，犹如东方学、非洲学；小而言之，犹如藏学、徽学。然而江南研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江南学”，所谓“学”者，学理也，学科也，只有以江南研究为基础，然后进行学理逻辑与学科体系的建构，并拥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才能真正从江南研究进而成长为“江南学”。

江蘇省志

卷之三

七



查清华 詹丹 主编

# 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

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论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论文集/查清华,詹丹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ISBN 978 - 7 - 5426 - 6177 - 7

I. ①江… II. ①查… ②詹… III. ①文学史—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I209. 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6766 号

# 江南都市与中国文学

## ——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论文集

主 编 查清华 詹 丹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620 千字

印 张 36.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6 - 6177 - 7 / 1 · 1364

定 价 88.00 元

# 目 录

关于“江南学”的几点思考	梅新林	1
吴歌越吟		
——诗化的江南民间文化	陈书录	11
江南地方戏多剧种通用的共同智慧和繁荣发展	周锡山	17
江南视野下无锡的文学史迹	吴新雷	32
汉魏六朝小说中仙境描写的江南特征		
——以上清派为考察对象	万润保	45
陆机生平、作品考证三题	杨 明	58
谢客去后的永嘉山水		
——从地域文学经典的角度论谢灵运温州诗风中的传承	钱志熙	67
论隋时《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丁红旗	84
江南都市的文化空间		
——以唐诗为对象	查清华	101
江南城市文化与唐宋文学的发展	邓乔彬	110
李白与五松山关系三考		
——兼论唐代诗人对后世文学地图意识的影响	查屏球	124
吴楚文化与皎然诗学	甘生统	142
唐代苏杭二州与第一“金曲”《望江南》词	李定广	155
论晚唐温李诗歌中的南朝		
——兼及唐诗中南朝主题的演变	刘青海	165
宋代兰溪范氏家族史料的若干问题	张 剑	175
南湖雅集：南宋都城私家园林的典范与文学活动	刘 方	192
儒、道之间：白玉蟾的诗词创作与心路历程	罗争鸣	209

宋元文化重心偏转东南述论	饶龙隼	222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史伟	242
南人北上与元代南方文人的“两都”书写	邱江宁	253
袁桷的学术渊源	查洪德	266
徜徉九峰三泖之间		
——古代松江诗画文化考略	汪涤	293
从四方新声到弦索宫腔		
——“中原音韵”与元季明初南北曲的消长	李舜华	307
江南才女之殇		
——张丽贞之情事自悔与本事演绎	丁淑梅	324
周汝登《唐诗助道》浅论	周兴陆	336
闵齐伋的编刊活动、编刊特点及其影响	赵红娟	345
陈子龙的魏晋观及其影响	吴思增	369
明末才子汤传楹与尤侗《钧天乐》传奇	杜桂萍	380
城市生活与诗歌新变	严明	399
明清吴江徐氏文学世家考述	郝丽霞	409
简论苏州城市书写与《红楼梦》人物之关系	詹丹	429
京洛风尘中的水乡慰藉		
——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的江南特质	陈玉兰 项姝珍	438
晚清江南小说文字地图与城市精神	张袁月	450
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	徐永斌	459
清代女批评家汪端“知人论世”的诗学观	付建舟	475
近代乡愚游沪小说中的城乡隔膜与对峙	施晔	490
王伯沆先生其人其诗	张煜	506
陆宝树《樵庵诗话》述略	杨煮	510
俞樾的俗文学观及其接受刍议	马丽敏	518
清季江南高氏家族与“前南社时代”	罗时进 邱睿	537
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		
——都市文化中的竹枝词创作	朱易安	551
“偶像破坏时期”的江南意象		
——哈佛燕京所见近代日本江南纪游诗四种述略	胡晓明	560

# 关于“江南学”的几点思考

浙江工业大学 梅新林

“江南”之为“学”而称之为“江南学”，是对江南区域研究的学理升华。从本质上说，江南研究是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综合性研究，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大而言之，犹如东方学、非洲学；小而言之，犹如藏学、徽学。然而江南研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江南学”，所谓“学”者，学理也，学科也，只有以江南研究为基础，然后进行学理逻辑与学科体系的建构，并拥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才能真正从江南研究进而成长为“江南学”。当然，“江南学”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建议学界就此展开讨论和争鸣。

## 一 “江南学”概念的提出及意义

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和亮点，有关“江南”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研究。“江南”是一个同时兼融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历史意涵与现实意涵的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空间概念，主要包含了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以及意象空间三重意涵，彼此有分有合，相互交融，由此形成“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泛江南”指长江以南地区；“大江南”包括今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中江南”指上海市、浙江省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即除去“大江南”中的江西省部分；“小江南”指环太湖流域地区，即所谓的“江南八府”：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诚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江南”区域界定，但通常都以此环太湖流域地区即“小江南”为核心区域。

20世纪的“江南”研究,是伴随近代学术转型而兴起,尤其是乘着新时期改革开放之东风而走向兴盛的。究其缘由,约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期积淀的历史优势。江南区域文化诞生、延续于长三角地区,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中国文化中心的逐步南迁,江南区域文化蓄势而发,后来居上。近代以来,更是临海凭风,引领新潮,在实现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其独特的开放精神与创新活力带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超越区域文化之上的独特意义与魅力;二是地处长三角的区位优势。这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国务院2010年5月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三是创新引领的学术优势。在当今学界的“文化转向”与“空间转向”的时代潮流中,江南同样得风气之先,以其最为丰硕的区域研究成果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的区域研究之路向,而且充分凸显了与世界对话与比较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学者提出了“江南学”这一概念。陈忠平、唐力行在他们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的《序言:奠定江南学的基石》中指出:“在21世纪开始之际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建立江南学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而对江南有关的史学研究成就作一系统总结,即是发展这一学科的前提。”“当然,江南学也需要国内外学者在各学科的通力合作,从不同学科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引进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由于现代社会科学趋于专门化的倾向,20世纪学者对江南地区的研究已日趋细致精深。但此种倾向也造成了这一领域内隔行如隔山的局面。本目录遵循现代历史学的原则,主要收录有关江南的史学论文。但我们也适当保持了‘六经皆史’的传统,收入了其他学科中涉及江南历史的论著。此举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学科内的学者在江南研究工作中的互相了解,以便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江南学学科。”此后,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胡晓明教授率先筹备成立了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并提出了“江南学”研究的“三结合”原则,即文学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国内与海外研究的结合,正式向学界亮出了“江南学”的牌子和平台。诚如陈忠平、唐力行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之《序言》所言,“江南是魏晋隋唐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对全国社会政治变迁有深刻影响,因而这一地区也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20世纪的学者已对江南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为我们将来在次领域的研究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目录收录评述有关江南地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诸方面流派、著述、成果等等的论著篇目或书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由于编纂时间所限，需要对 2007 年以来的丰硕成果加以补充，但这毕竟是 20 世纪江南综合研究成果的首次总汇，基本反映了江南研究从 20 世纪前期的初兴、中期的衰滞到后期的繁荣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尤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江南研究的衰而复盛正与改革开放 30 年相同步。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江南研究成为国内区域研究中的显学，积淀深厚，成就卓著，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 二 “江南学”研究的多重学术价值

从江南研究的勃兴，到“江南学”的提出以及后续的推进，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1. 范式建构的学术价值。区域史的研究是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势，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同样，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过去的注重时间向注重空间研究转变。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不同，区域研究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涵盖了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这就对传统的专门化研究理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相关学者的固有知识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需要综合性的学科顶层设计和构想，更需要拥有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的跨学科沟通与合作。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研究中，江南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范本意义和价值，所以，从江南研究走向“江南学”的学理建构，无疑具有探索区域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意义。

2. 历史反思的学术价值。武廷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sup>①</sup>一文中提出“江南之江南”、“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的三阶段论，即从远古到东晋江南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前，为“江南之江南”阶段，也是以江南本土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历时最长，但积淀不厚，所以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位；东晋南朝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以后，由“江南之江南”进入了“中国之江南”阶段，并在南北、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先后形成三次高峰；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再由“中国之江南”进入“世界之江南”阶段，江南文化由此

<sup>①</sup> 《华中建筑》2000 年第 9、12 期。

开始了走向世界与现代转型的历史新征程。从“江南之江南”到“中国之江南”再到“世界之江南”，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为此付出了许多沉重的历史成本与代价。历史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教训，更是一种智慧，我们研究江南，首先在于总结昨天，但更重要的在于启思今天，展望明天。

3. 整体通观的学术价值。唐力行在《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sup>①</sup>中强调指出：“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一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例如江南、徽州等，都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鉴于江南在中国地理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则江南之于深化中国整体研究同样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4. 国际对话的学术价值。美国加州大学王国斌先生曾在《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sup>②</sup>一文中提出了“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两个概念，阐述了他对于区域与整体关系的见解。所谓“区域性世界”，是指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所谓“世界性区域”则是指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伴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及区域与外界之间联系的加强，由此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互动、发展与变化，于是从前的“区域性世界”即变成了“世界性的区域”。在此过程中，又是以江南“导夫先路”，率先完成了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转型历程。而就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区域研究的关注程度而言，也同样以江南为冠，在日本和欧美，活跃着一批致力于江南研究的知名学者。就此而言，深化“江南学”研究，进而具有加强国际学术对话的意义。

5. 精神皈依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江南文化精神具有剑与箫的双重特性，与“剑”相联的是壮烈、阳刚、豪放，与箫相联的是灵性、阴柔、婉约。“剑”喻抱负，“箫”喻诗魂；“剑”喻狂放，“箫”喻缠绵，由此构成壮怀报国之剑气与幽情赋诗之箫心的奇妙组合。从基于时空而又超越时空的多维视角观之，则“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主要呈现为先“剑”后“箫”、南“剑”北“箫”、内“剑”外“箫”三种形态。<sup>③</sup> 胡晓明教授则以自己的一份诗心对固有的

<sup>①</sup> 《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第 5 期。

<sup>②</sup> 《史林》2007 年第 5 期。

<sup>③</sup> 《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7 月 12 日。

“江南”进行了一番“再发现”:中国文学悠久的传统中,从汉代到清、近代,一直隐隐相传着十分重要的江南意象。持久、含蓄而入骨的相思,以及永续的乡愁,是江南不变的芬芳迷魅。男女之思,友朋之念,以及越到后来,以男女、友朋寄托家国君臣之思,相互重叠着、涵化着,渐成江南意象的深层含义。江南意象是江南认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作为江南认同的江南意象,含蓄而动人地揭示了江南认同的底蕴:家国之爱。这种文化认同,实质上即是一种超越现实而回溯生命本源的精神皈依。<sup>①</sup>

### 三 “江南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江南区域研究重心在江南,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汇集了从事江南区域研究的主体力量。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建有以“江南”命名的研究机构,业已成为当今“江南学”研究的两大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积极倡导文学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国内与海外研究的结合的“三结合”原则,重点开展江南社会史、江南文学艺术、江南文学家族以及江南典籍文献研究,先后召开了“江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交流会(2006年9月17日)、“明清江南史研究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7日)、“全球视野下的江南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10日)等重要学术会议,出版了《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王家范)、《文化江南札记》(胡晓明)、《江南家族文学丛编》(胡晓明、彭国忠主编)等著作。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是海内外较早正式以“江南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并于2006年3月经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的主要学术目标是力争成为两个“中心”、一个“高地”,即通过集聚研究力量开展重大项目的协同攻关,推出系列精品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全国江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心;通过创建富有特色的图书资料中心与“江南文化网”,使之成为江南文化研究的文献中心;通过卓有成效的学科整合与学术创新,造就一支在全国具有学术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高水

<sup>①</sup> 《“江南”再发现——胡晓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平学术研究团队,使之成为江南文化研究的人才高地。基地凝练并设立了江南文学与艺术、江南学术与文献、江南城市与社会三个重点研究方向,近年来共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3 项,省部级项目等 80 余项,其中梅新林主持的“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基地先后推出了“江南文化世家系列研究”、“江南城镇通史系列研究”、“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系列研究”、“浙东学派系列研究”,“农村改革 30 年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系列研究”等重点项目,并编纂出版了《新编金华丛书》、《吕祖谦全集》(黄灵庚主编)。目前,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陆续出版,由陈国灿主编的七卷本《江南城镇通史》也即将出版。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苏州大学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两个研究机构也在江南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新创立的首批六个研究院之一。研究院由三个平台构成:第一个平台是上海市,它以上海师范大学为基地,涵盖上海市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化单位,基本汇聚了上海主要的研究力量;第二个平台是国内平台,它立足上海,主要选择上海、北京、香港、台北四座有代表性的都市,整合两岸四地的研究力量;第三个平台是国际平台,首先是东亚地区的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然后是欧美地区的纽约、巴黎和伦敦等,这方面已与美国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研究成果集中于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文化与文学研究。首席专家孙逊教授在包括江南在内的都市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sup>①</sup>、《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sup>②</sup>、《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sup>③</sup>、《江南都市文化:历史生成与当代视野》<sup>④</sup>、“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sup>⑤</sup>、《明清江南城镇的兴盛及其文化辐射功能——以《鸳鸯湖棹歌》的唱和为考察中心》<sup>⑥</sup>等论文。而在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唐力行、徐茂明等不仅发表了系列学术论著,而且在区域理

①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③ 《文学评论》2007 年第 3 期。

④ 《学术月刊》2009 年第 2 期。

⑤ 《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0 期。

⑥ 《学术界》2012 年第 3 期。

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而在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唐力行、徐茂明等不仅发表了系列学术论著,而且在区域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苏州大学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该中心整合以文、史、哲、经各学科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力量,致力于吴地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在社会、昆曲、园林、工艺、文学、经济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迄今为止,共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5百余篇,为政府部门提供各类调研、咨询报告数十份,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数十项。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吴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研究、江南家族研究以及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等。

江南城市与经济研究力量和成果主要集中于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戴鞍钢、张海英教授,南京大学的范金民教授等相继发表了大量有关江南市镇历史经济、社会方面的学术论著。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2002),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2005),戴鞍钢的《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1996)、《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998),张海英的《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2002)等,皆为江南城市与经济研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在江南地理、文化、文学研究等方面也多有建树。由范金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演进研究》正在顺利展开,并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书录教授致力于江南士商互动研究,在经济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当然,江南区域研究并不限于江南,而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比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18世纪的江南与荷兰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近千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重点科研项目《17—19世纪中期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等课题的研究,出版《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2002)、《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2002)、《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年)》(主编,2004)、《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2009)等学术著作,对江南经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江南学”的学理要求衡量,目前国内的江南区域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严格地说,还受到许多瓶颈问题的制约:

一是理论建构问题。江南研究之成长为“江南学”，迫切需要在有关“江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重要问题上展开学术讨论和争鸣，同时还需要一系列工具性概念的支撑。但迄今为止，学界仅仅是提出了“江南学”这一概念，而对上述一系列问题都还无暇涉及，更谈不上形成学术共识。理论建构上的滞后，必然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

二是学术壁垒问题。“江南学”作为综合性和跨学科研究，既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通力合作，同时也需要处于不同区域的研究机构与学术力量的通力合作。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已联合举办两次学会议。2011年7月，在浙江师范大学首次搭建起了“江南文化论坛”的平台，随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江南文化论坛”栏目。但总的来看，无论是合作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打破彼此的学术壁垒并非一件易事。

三是研究队伍问题。在目前固有的学科体系中，区域研究分散于哲学、经济、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不同学科之中，尚未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也难以实现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整合，这就使得“江南学”的人才培养存在着先天不足。与此同时，在江南高校内部有关江南区域研究机构设置过少，从事江南区域研究的学者多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展开研究，缺少相关科研平台强有力的支撑，缺少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难以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攻关。

四是资源共享问题。江南文化积淀深厚，文献积累丰富，研究成果丰硕，这些都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开发，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成可以为学界共享的数据平台。尽管一些学者已关注这一问题，但限于资金、人力以及协调等问题，迄今进展不大。

#### 四 “江南学”研究的未来突破方向

鉴于目前的研究成果与存在问题，需要学界围绕未来“江南学”研究趋势与发展方向展开讨论，以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个人认为，未来“江南学”研究应该呈“T”字型的理想状态向前推进，即一方面是在“竖”的方向上不断细化和深化。具体而言，一是专题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江南学”本是一个综合性的区域研究，需要多学科或跨学科的交融与整合，但其前提是多学科或

跨学科中相关分支学科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化。换言之,只有将“江南学”研究中涉及的哲学、经济、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才能为多学科或跨学科的交融与整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亚区域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江南区域版图包括了今浙江、上海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地区,需要对这些不同地区展开“亚区域”研究,而且此“亚区域”因不同层级划分而依次向下深化,比如作为其核心区域的“江南八府”,可以每府为“亚区域”研究单位,甚至还可以延伸于“江南八府”中更为基层的单位。同理,只有将“江南学”研究中涉及的不同层级的“亚区域”加以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才能为江南区域的整体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在“横”的方向上的跨学科整合与贯通。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一是江南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江南区域与中原、齐鲁、巴蜀、岭南等不同区域之间,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进而深化江南区域研究;二是中国版图中的江南区域研究。区域研究之和不等于整体研究,但整体研究有助于深化区域研究,彼此是一个互动并进的过程。以中国版图透视江南区域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彼此研究的深化,而且会更加凸显江南区域研究的范本意义。三是世界视野中的江南区域研究。包括文化关联的互观和特定区域的比较,上述李伯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至18世纪的江南与荷兰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即属于后者。

从目前江南区域研究的重心来看,较为集中的是文史两个学科,其次是城市经济领域,此外还广泛涉及哲学、经济、艺术、宗教等不同方面。未来的“江南学”研究应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大力提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着力推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突破:

一是理论研究的突破。要在总结和提炼既有江南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区域史研究理论,重构融合世界视野、本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江南学”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当前,需要重点梳理和确立“江南学”的学理逻辑、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发展方向等,并在理论建构与方法整合上取得新的进展。

二是整体研究的突破。要对江南区域研究方向与路径进行整体设计,通过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交融与合作,努力推进江南区域的整体研究,以更好的把握江南区域研究的宏观导向,并以此引领江南区域研究的走向深入。

三是专题研究的突破。专题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基础,彼此应该相互融通,

相互促进。总的来看,目前的专题研究重在文史以及城市经济等学科领域,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力加强,尤其需要在各相关学科的专题史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四是比较研究的突破。包括江南区域内“亚区域”的比较研究,江南区域与中国版图内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乃至江南区域与世界特定区域的比较研究,由此便可从江南之内看江南,上升到跳出江南看江南,当会有一番新的认知与感悟。

五是文献整理的突破。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当地古籍文献的重视以及高校学者的积极参与,江南历代经典文献的整理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实存文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需要将这些文献整理成果及时转化为数据库,以便更好地为学界所共享,这对于推进“江南学”研究的深化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吴歌越吟

——诗化的江南民间文化

南京师范大学 陈书录

西晋时左思《吴都赋》中有“吴愉(歛)越吟”<sup>①</sup>之说,《文选》李善注“愉(歛),吴歌也。”<sup>②</sup>所谓“吴歌越吟”,是指江南的民间歌谣。吴歌越吟,来自于江南民间,流传于江南民间乃至全国,是诗化的江南民间文化,是区域民间文学中一道道时尚的风景,走近这一道道风景线,如同“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sup>③</sup>。

##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盛开”的 江南民间文学的时尚风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民歌或拟民歌主要采自北方,“《三百篇》中,无吴、越之诗”<sup>④</sup>,但早期的吴越地区也流行民间歌谣。吴歌越吟的先祖可追溯到黄帝时代的《弹歌》,《弹歌》又名《断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sup>⑤</sup>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描写了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进而用弹丸去捕猎的一系列过程,语言质朴自然而内容丰富,在当时可谓江南歌谣中的“一枝独秀”。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93页。

③ 刘义庆编、徐震谔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第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2页。

④ 蒋士铨,《越风序》,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页。

⑤ 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